

公民素養的培養－談童軍快樂助人的重要

管曉真

臺南市立北區文賢國中教師

陳敏銓

臺南市立中山國中教師

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

一、前言

世界性的童軍運動自西元 1907 年創立，自始風靡世界各國而有童軍組織；我國於建國元年就有童軍活動的發展，之後更因國家背景因素而將「童軍」定為科目，歷經教育改革之下，國中階段仍於「綜合活動－童軍」課程中實施。除了正式課程之外，我國童軍團以學校童軍團為多數，童軍團學生除了在學校各式活動中展現助人、服務外，平時也可能是學校學務處行政團隊的小幫手。

由此可知，童軍的教育價值與理念是學校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中，可作為培養學生良善行為的媒介，本文也藉由探討童軍中兩個重要的核心「快樂」及「助人」的意涵來作為公民素養的培養。

二、「快樂」「助人」的童軍理念

童軍運動的許多原理原則及價值，來自於童軍的諾言、規律與銘言，在世界童軍總會（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，簡稱 WOSM）於 2019 年發布「童軍運動的基本特質」中也說明童軍的八個方法：從做中學、符合個人的進程、小隊制度、成年人的支持、具象徵的架構、大自然、社區參與，以及居於核心的童軍諾言與規律；從此可見，不管童軍活動因為國情不同而有所不同，其希望培養青少年的都是良善的價值觀與品格。

童軍活動的四個目標「品格、健康、服務、手藝技巧」，品格是童軍最為重視的目標，童軍希望能培養青少年成為良好健全的公民，而顯現於社會的行動則為「服務」，品格與服務技巧的養成都來自於童軍從小到大、從童軍團到社會不斷的「助人」。雖然十二年國教政策中的多元學習表現，也希望所有國中學生都能夠過「服務學習」來學習，但因為與升學掛勾，當學生做完服務後就可以增加服務時數，以至於其對於品德的培養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影響（陳敏銓，2016），這與童軍內化助人的觀念於品格培養是不同的。

古希臘學者柏拉圖認為「善」是世界一切理念存在的原因，「善」也是最高的理念，助人、服務等看似不同的名詞，其實都隱含著對社會「行善」的美意。有人行善是為了自己，也有人行善是因為利他，但不管如何，行善的結果都是「利社會」的行為結果。有人助人服務時是自願的，因此可能會產生愉快地經驗再次

服務，但也有人是被半強迫的，或是被利益所驅使（如獎勵），因此可能會有不愉快的經驗，而不會有下次的助人服務；但強調自願參加的童軍，其進行的助人服務活動，往往都是「正向」的心理感受。如我國童軍諾言第二條「隨時隨地扶助他人，服務社會」，女童軍諾言第二條「我願隨時幫助他人」；童軍規律中的第三條「助人：盡己之力，扶助他人，每日至少行一善事，不受酬，不居功。」在女童軍的規律中第三條「女童軍是助人的」；除此之外，童軍銘言「準備、日行一善、人生以服務為目的」等，這些都揭櫫了「助人」在童軍活動中的價值和重要性。除此之外，在童軍規律中的第八條「快樂：心常愉快，時露笑容，無論遇何困難，均應處之泰然。」且在女童軍的規律中第八條「女童軍是快樂的」，也闡釋了期勉童軍處世及行善的心境。「快樂」、「助人」是童軍理念價值的呈現。

童軍的諾言、規律、銘言，是期勉童軍的心理與行為表現出「善」的理念，體現的方法就是教育方式的呈現，童軍運動的八個方法中最居於核心的就是童軍的諾言與規律，因此所有的童軍活動都應該圍繞著童軍的諾言與規律來進行設計，賦予教育的意義。除此之外，我國綜合領域在國中課綱的學習內容「童 Bb-IV-3 服務活動的反思與多元能力的展現」、「童 Aa-IV-1 童軍諾言、規律、銘言的品德實踐與團隊目標的達成」，實際上也希望童軍中重要的價值與理念能讓學生了解並實踐。

三、助人是利社會行為

許多研究常常將利他（altruism）、助人（helping）及利社會（prosocial）行為交互使用，有些甚至視為同義（陳敏銓，2016），「利社會」的英文是以 pro 為字首的英文字義具有擁護和支持的意思，因此「利社會行為」通常是指認同社會並促進社會運作的行為（簡嘉盈、程景琳，2012）。人類行為可以分成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行為（Bar-Tal, 1976），積極的行為就是利社會行為，包含幫助、分享、協助、互惠、合作等對他人或群體具有正面意義的影響都算是利社會行為（羅瑞玉，1997），因此當個體能表現出有利於他人或團體的行為，無論動機是純粹利他或是利人利己、互惠互助，都可以說是利社會行為（陳敏銓，2016）。

如果說「日行一善」，我們常常想到的就是童軍，而童軍助人的行為就是一種利社會行為；但是，參加童軍是如何培養這種行善助人的觀念和行為呢？參加童軍即參加某一個童軍團，每個童軍團都會有 2~4 個小隊，每個小隊約有 6~8 個人，平常的童軍團集會或是團活動，都會與其他小隊夥伴一同學習與訓練，因此在進行的過程中，與他人互動就會產生如學者說的幫助、分享、協助、合作等正面的積極的利社會行為，當童軍熟悉這樣的態度與情境，自然就會產生與他人為善的好品格。當他人不會的時候，會的人就會去教不會的人，經驗足夠的人分享

怎麼通過考驗，怎麼突破進程，整個小隊、整個童軍團會越來越棒。

在童軍的組織中，會由年長者、較具經驗的人擔任聯隊長、幹部、以及各小隊的小隊長和副小隊長等，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過程中，以及成年服務員的協助下，童軍也會潛移默化下學習更多的利社會行為；因為較年長的青少年認知結構較成熟，會具有更多的利社會行為可以提供學習（Carlo & Randall, 2002; Fabes et al., 1999），也因為拓展的社會環境變大，讓他們學習到更多的利社會行為技巧、或較具有同理心、較能與他人互動（Carlo et al. 2003; Kokko et al., 2006）。

助人服務對童軍來說不是一種約束，而是一種教育方式，讓童軍能藉由助人服務的過程感受到內心的付出帶來有意義的感受，並從中感受到快樂與行為的價值意義；所以，童軍從在童軍小隊中、到童軍團，乃至於童軍團帶到社區服務、進行社會行動等，這些都可以培養童軍的利社會行為，如同 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提到人類行為是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來學習，是一種楷模的認同與模仿（imitation）來學習（Bandura, 1977），藉由成年義務服務員設計及引導的團集會和各種童軍活動，讓童軍耳濡目染之下受到潛在課程的楷模學習，並能把付出、助人、服務視為生活的一部分，進而在其他領域內實踐。

四、快樂助人隱含著正向心理學

Seligman 早期提出正向心理學包含了正向情緒（positive emotions）、正向特質（positive characters）和正向組織（positive organizations）三個內涵，但於 2011 年提出正向心理學的目標應該是「走向幸福感」的生活，其內涵為正向情緒、正向關係（positive relationships）、全心投入（engagement）、具有意義（meaning）和成就感（accomplishment），這也是 PERMA 幸福感理論（Seligman, 2011）。

正向情緒包括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正向情緒；過去的正向情緒，往往是過去事件所引發的，如快樂、幸福、成就感、滿足感等正向情緒，現在的正向情緒是由眼前所經歷的事件引發的，包括快樂與成就感等正向情緒，未來的正向情緒是指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正向情緒，如希望和樂觀等正向情緒。在童軍成為公民的養成過程中，藉由不斷的助人過程培養童軍的正向情緒，當童軍在面對困難或助人情境時，會展現快樂、助人的態度與技巧，對於未來即將發生的服務行動也會有正面的心態。相關研究如 Luks（1988）提出肯幫助別人的人會越來越快樂，Midlarsky（1991）、Clary 等人（1998）提出從事助人行為有助於提升正向情緒，Post（2005）指出助人行為和幸福、快樂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

Tarragona（2014）提到正向的組織或團體可以發展正向情緒、正向關係與正向特質，進而產生正向經驗與幸福感；發展正向關係也包含了參與正向組織，從

童軍小隊、童軍團、聯合童軍團活動、走入社區、與服務活動的組織連結，這些都是在發展正向的人際關係，促進公民的美德，以及與社區組織的良好互動；正向心理產生的幸福感就是進行社會參與的感受，以及積極面對生活環境產生的正面影響（Seligman, 2011）。

童軍活動中常設計展現助人精神的服務活動，這樣的任務或說是挑戰需要全心投入，讓童軍覺得這是有意義的，而且雖然困難但感覺可以完成，於是在完成的過程中會讓童軍處於類似高峰經驗（peak experience）的流暢狀態（a state of flow），而這種流暢的狀態有人簡稱為「心流」，這樣的經驗會讓人覺得生活具有目標，且更想要全心投入於活動中（Berman & Davis-Berman, 2005）。

全心投入的人往往也較能收到回饋而獲得「意義」，從各種經驗中獲得意義讓生活更有價值（Seligman, 2011; Tarragona, 2014），而這樣產生的「意義」會讓人產生目標和建立人生的方向（Grenville-Cleave, 2012）；除此之外，Seligman（2011）認為「意義」也來自於歸屬感，因為在建立正向人際關係時，也會發展出個人的意義與目標（個人目標與團體目標），因此當個人關心與他人的評價時，主要在個人認為自己是團體中的一份子（Keyes, 2002）。而童軍活動的進行，是以小隊為基本的單位，因此屬於童軍團的一份子、童軍小隊的一員，這樣的角色更容易形塑參加童軍的青少年的品格，以及發展良好的關係、全心投入的參與及創造生命的意義。

個人如果達到目標就會產生成就感，這樣的成功經驗可以促使個人正向心理的發展（Grenville-Cleave, 2012; Seligman, 2011），因此，若全心投入獲得的成就感也更具更有價值的「意義」，在這過程中與他人的正向關係，及正向情緒的發展，這些都是相輔相成讓個人具有正向的心理。而童軍的支持系統，如小隊的夥伴、童軍團的夥伴、其他童軍團的夥伴，以及團領導人員等成人領袖的支持，讓童軍可以自主的面對挑戰，讓青少年參與決策也是世界童軍總會重要的政策（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, 2015）；世界童軍總會目前也推動各項與 SDGs 有關的助人服務，除了培養童軍的健全人格，也讓童軍的服務讓整個世界更美好。

童軍的教育目標是培養青少年成為一個健全的公民，當青少年參加正向的童軍組織活動，在童軍活動中發展正向的關係，在過程中產生個人的意義與價值，發揮正向的能量，進而提升童軍的公民美德與社會責任，促進人們生活在美好的社會，進而提升幸福感。因此，快樂助人是可以作為培養公民素養的情意和態度的養成，當多數人喜歡快樂助人，除了獲得 PERMA 的幸福感，我們的社會也將因為這些善行越來越美好。

五、快樂助人是公民要培養的素養

2010 年我國舉行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，並將「公民素養」作為討論的議題之一，指出其六大內涵：生命與品德教育、人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、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、生態與環境教育、安全與防災教育、藝術與美感教育；我國教育部也在 2011 年推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計畫，並指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包括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、媒體及美學等素養；然而這些提出的素養，就像早期的公民教育課程類似，將其公民素養劃分成知識學科的範疇，如法治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倫理道德等，陳佳欣（2012）認為公民素養被切割成幾大範疇（如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、媒體及美學等素養），可能過於狹隘（難道沒有其他範疇？），而如果又將這些範疇切割出評量標準（如能力指標）顯然是行不通的。

培育公民素養不只是提升相關知識而已，更不能忽略成為良好公民所需的情意態度，以及參與公民生活必需具備的行為實踐技能（沈桂枝，2017），一個具備公民素養的人，應該有能力積極參與當地社區及其他有意義的社會活動，去嘗試引發改變社會，讓社會變得更好（Urban Agenda, n. d.）童軍的快樂助人就包含此意涵，從童軍小隊、童軍團到社區的連結，就是希望能培養成為公民的所需要的情懷與態度，進而到社會服務等其他的社會行動，或者與國家、世界連結的議題行動，就如世界童軍總會在推行的 SDGs 的社會行動方案，或者如世界女童軍總會目前在推行的國際女孩日、終結暴力等活動，其進行的倡議（advocacy）對社會上需要被改變的事物發揮實質影響、創造改變（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, 2014）。

除此之外，前述談到快樂助人的正向心理學內涵，正向心理學以正向情緒為基礎，在正向的團體與組織中發展與他人的正向互動關係，獲得環境支持、對人對己的關懷，全心投入、利己利他，產生成就感與意義，其正向心理產生的行為漣漪，能促進整體社會和諧與進步（Ryan et al., 2019; Seligman, 2011）。另外，Piaget 提出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為認知結構的成長會影響人類的行為，所謂的發展就是讓個人的認知從簡單到複雜的成長過程，而這樣的觀點下，認知結構發展越好越容易產生利社會行為，而產生越多利社會行為也代表個人可能比較具有「道德」（陳敏銓，2016）；因此，快樂助人的理想與行為，可以透過童軍活動培養青少年成為良好健全的公民，並樂於行善與助人。

六、結語

童軍是全球性重要的青少年教育組織，雖然其活動性質是非正式的學校教育內涵，但其產生的影響與傳遞的良善理念能協助青少年發展自我；童軍活動可以從幼兒階段可以參加，一直到成為成年人則可以扮演支持青少年發展的義務服務

員。其「心常愉快，時露笑容，無論遇何困難，均應處之泰然」的快樂，與「盡己之力，扶助他人，每日至少行一善事，不受酬，不居功」的助人，這些觀點不僅影響著正向心理人格特質的改變，也進而產生與他人互動、協助他人、服務他人的利社會行為發生。

在我國，政府將童軍運動的價值理念置入於學校的正式課程中，不啻是認同童軍活動的教育性，藉由童軍的目標、方法讓學生具有良好的品德及戶外生活能力；童軍快樂助人及行善能讓自己成長、具有正向的心理及公民的素養，也能透過實質得幫助他人，促進社會產生良善的循環。

參考文獻

- 沈桂枝（2017）。以社會行動課程培育學生公民素養：國小六年級「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」之實踐。《教師專業研究期刊》，14，27-58。
- 陳佳欣（2012）。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指標報告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、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。
- 陳敏銓（2016）。十二年國教服務學習時數政策下國中學生利社會行為之研究—以臺南市為例。《教育研究學報》，50(2)，73-99。
- 簡嘉盈、程景琳（2012）。同儕對高中生之利社會行為的影響：檢視同理心與友誼特性之調節角色。《教育科學期刊》，11(1)，105-123。
- 羅瑞玉（1997）。國小學生的利社會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（未出版之博士論文）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。
- Bandura, A. (1977). *Social learning theory*. Prentice-Hall.
- Bar-Tal, D. (1976). *Prosocial behavior: Theory and research*. John Wiley.
- Berman, D. S., & Davis-Berman, J. (2005).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outdoor education. *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*, 28(1), 17-24.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105382590502800104>
- Carlo, G., & Randall, B. A. (2002).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behaviors for late adolescents. *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*, 31(1), 31-44. <https://doi.org/10.1023/A:1014033032440>

- Carlo, G., Hausmann, A., Christiansen, S., & Randall, B. A. (2003). Socio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tendencies for adolescents. *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*, 23, 107-134.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272431602239132>
- Clary, E. G., Snyder, M., Ridge, R. D., Copeland, J., Stukas, A. A., Haugen, J., & Miene, P. (1998).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s of volunteers: A functional approach. *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*, 74(6), 1516-1530. <https://doi.org/10.1037//0022-3514.74.6.1516>.
- Fabes, R. A., Carlo, G., Kupanoff, K., & Laible, D. (1999). Early adolescence and prosocial/moral behavior I: The role of individual processes. *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*, 19(1), 5-16.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272431699019001001>
- Grenville-Cleave, B. (2012). *Introducing positive psychology: A practical guide*. Icon Books.
- Keyes, C. L. M. (2002). The mental health continuum: From languishing to flourishing in life. *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*, 43(2), 207-222. <https://doi.org/10.2307/3090197>
- Kokko, K., Tremblay, R. E., Lacourse, E., Nagin, D. S., & Vitaro, F. (2006). Trajectori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iddle childhood: Links to adolescent school dropout and physical violence. *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*, 16(3), 403-428. <https://doi.org/10.1111/j.1532-7795.2006.00500.x>
- Luks, A. (1988). Helper's high: Volunteering makes people feel good,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. *Psychology Today*, 22(10), 39-42.
- Midlarsky, E. (1991). Helping as coping. In M. S. Clark (Ed.), *Prosocial behavior* (pp. 238-264). Sage.
- Post, S. G. (2005). Altruism, happiness, and health: It's good to be good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*, 12(2), 66-77. https://doi.org/10.1207/s15327558ijbm1202_4.
- Ryan, R. M., Ryan, W. S., Di Domenico, S. I., & Deci, E. L. (2019). The nature and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autonomy and flourishing: Self-determination theory and

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. In R. M. Ryan (Ed.), *The Oxford handbook of human motivation* (pp. 89-110)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
- Seligman, M. E. P. (2011). *Flourish*. Simon & Schuster.
- Tarragona M. (2014).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life coaching. In Joseph, S. (Ed.), *Positive psychology in practice* (2nd ed., pp. 249-266). Wiley.
- Urban Agenda (n.d.). *What is civic literacy?* Retrieved September 19, 2023 Retrieved from <http://urbanagenda.wayne.edu/whatiscl.htm>
- 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 (2014). *Learning to thrive*.
-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(2015). *World scout youth involvement policy*.
-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(2019). *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couting*.

